

科学就是科学, 日历撕掉今年的最后一页, 2020年再凶猛, 也就过去了。只是, 科学毕竟只是科学, 所有生命乃至蛋白质片段, 却受神秘莫测的自然法则支配: 显然, 疫情还没有过去, 人类依然被疫病的威胁笼罩。

来 让我们勇敢翻篇

池 莉

爱因斯坦有这么一句话: “每一个认真钻研科学的人都会相信, 某些精神力量明显存在于宇宙的规律之中, 比人类力量要优越得多。”这是爱因斯坦在1936年1月24日, 回复小女生菲莉丝的信中所说。我深信小女生菲莉丝能够明白爱因斯坦的话, 我却不尽然。不过, 尽管在理解上不那么自信, 爱因斯坦的话, 还是足以成为我在2020年并今后的精神向导。可是吗? 除了努力寻求更优越的精神力量,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 咱还能够怎样?

作为一个武汉人, 咱还能够怎样? 口罩都戴了三百六十五个日子还会继续戴。尽量宅家尽量保持社交距离也都熬过了春夏秋冬还会继续熬。洗手消毒什么的, 该做的, 都做了。出个门, 只露一双机警小眼睛, 就像受惊的兔子, 一有风吹草动, 立刻窜回小窝, 得经常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是英雄的城市啊是英雄的人民啊, 得靠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

相对来说, 我还好。我还好的原因之一是: 我原本学流行病出身。我的第一个大学, 专业就是流行病。我的第一份职业, 就是流行病传染病防治医生。由于并不陌生, 就没有太多恐惧, 第一时间知道狼来了, 就赶紧朝大家呼喊, 就一头忙到具体事务中去了: 在各种媒体紧急呼吁, 对本市防疫提出建议——被媒体朋友戏谑称为“池六条”。也反倒比往常更为勤奋地动起笔来。仅在新民晚报夜光杯, 就连发了好几篇散文, 这个系列散文除了在国内被广泛转载, 也很快在法国在埃及被翻译传播。我还在《北京文学》重发旧作新读《霍乱之

乱》, 又新发中篇小说《封城禁足99天 脑子里闪过些什么》。我的写作, 是一种积极渴求, 我在寻求更健康更优越的精神力量。

我还好的再一个原因是: 对于大众来说, 封城隔离居家禁足是最难受的, 而对于我, 情况有所不同。民间戏称作家为“坐家”, 宅家写作与阅读, 正是我本行。我生来又拙于社交, 喜独处静思, 闭门即是深山, 读书随处净土, 也就觉得个人生活方式并无多大改变。

再艰险的世道, 也并非没有可喜之处。这一年我阅读量大增。为要静心, 读以赛亚·柏林。气氛恐怖, 读东野圭吾。倍感自己愚蠢, 读特别聪明的朱利安·巴恩斯。没有理由的, 我还再一次重读了张爱玲。《异乡记》, 没有写完的半本书小册子, 当我以2020年的年龄与阅历再次细读, 又读出了新的震撼与心得, 对于检视自己的生活态度以及作出果断决定, 都有极大启发与支持——更优越的精神力量! 有一些更优越的精神力量, 来自于天才的智慧, 这或许是天才自己都不知道的。只因天才的独创性, 往往来自非理性的感性深渊, 在感性的最深处, 要有光, 就有了光。且不说还有音乐。贝多芬交响曲全套, 马勒交响曲全套, 不许跳过, 一一听过来, 那几乎是能够直接领会的更优越的精神力量。古典音乐大师们从来不死, 现当代音乐杰作层出不穷, 是一个人得有多少独处岁月, 才能够享用呢。

生活是行动, 的的确确不只是数字。来, 让我们用行动勇敢翻篇, 把自己内心的沉重气氛与紧张情绪翻过去, 疫情不肯过去我过去, 解脱自我惊悚, 敞开大门, 与大地重逢。

十日谈

我的2020年
责编: 刘芳

那些不好的, 也要心存感恩, 请看日本栏。

书房之美在于凌乱, 在于一直处在似整未整的状态之中。

书房之乱

张家鸿

我的书桌是乱的。昨天请进来两本书和此前的旧书混在一起, 边上又有新的刊物、旧的报纸, 偶有急切整理的念头又因疏懒迅疾归于寂灭。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 书桌之乱便是常态。

我的书柜是乱的。藏书之分类可以按照作者、国别、出版社来, 可以按照是否题签本或签名本, 亦可以依新旧来区分。起初, 也确实尽量按照这些原则来摆放, 然而摆着摆着便觉得, 它们并非泾河与渭水那般, 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乎, 后来的书想搁哪里就哪里, 只剩随意率性。凌乱即参差不齐, 无须分门别类。为已所用的书房, 非面对公众的图书馆, 服务于公众, 图的是方便, 书房图的不是方便, 是快乐、有趣、自在。分门别类仿佛一个人整日板着一张面孔, 见人就是训诫, 逢人便是警示, 岂不累乎? 话虽如此, 我还是经常在书房里忙得不亦乐乎: 把有作者签名的和没有作者签名的分开摆放; 把文史的与教育的分开搁置; 把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按体裁区分开来; 把读过和没读过的各放一处。

这是我一直在做却一直一直没有做完的事情。每读完一本书, 我就要琢磨着应该把它放在哪里才是最适宜的。每次都

随意得很, 因而我的藏书看似安排得井井有条, 内里却是乱象百出的。 我是不懂藏书的。藏书家的收藏常有明确的方向, 要么指向一个朝代, 要么指向一个门类, 要么指向一个作者。拥有近万册书籍的我, 买书读书从来都是随性之举, 少有刻意的时候。即便收藏了一些喜欢的有始无终、半途而废。收集巴金先生的书已有多年, 在六七十册的数量上就停滞不前。人与书之间, 讲究的是缘分。

我搬过三次家, 每次搬迁都不忍离去, 但都因各自工作、家务繁忙, 分别后和邻居的来往仅有限几次, 最后也与老邻居们失去了联系。

年轻的邻居

庞荣棣

现在的家住了近20年, 却成了孤家寡人。每天, 一把锁、一盏灯陪伴, 过着许多空巢老人类同的生活。没有呼朋引伴, 也不去公园散步, 更不敲邻居的门, 每天, 做完家务, 就闭门不出, 过着隐居的日子。

由于是个电脑盲, 在写作过程中不时被“堵”。早先, 老伴健在, 有依赖, 之后, 儿子们有各自小家, 无暇顾及我。于是, 同年搬进来的谢岗博士就成了我经常麻烦的对象。他无数次的急救、指导, 帮助我解除了一次又一次障碍。有时, 他不在, 他太太小张也会主动热心地楼下给我深入浅出讲解, 唯恐我不开窍的脑子不理解。每逢遇到他父母, 我总会表达感谢。二老同

样热情地说: “尽管叫他们好了! 不要紧的!” 后来, 隔壁搬来一对年轻人, 热情敲开我家门, 送来新婚大喜糖果。

次日, 又送来一盘他们自制的西点热蛋糕, 我笑纳了。新娘闵蓓蓓毕业于英国某大学, 夫君王冲硕士, 之后升任公司经理, 工作很忙, 为我电脑解困也尽可能给予帮助。一次, 很晚了, 他背着行囊, 拎着包敲开我家门, 说刚出差回来, 还没回家, 先来给我解决电脑问题。之后, 他们一双可爱的女儿相继诞生, 每逢年节他们不忘带着孩子回老家, 与父母共度其乐融融的节假日。回沪时, 满带着自家院子里种养的各种绿色无污

染的菜、鸡、鸭、蛋等等。每次, 都有我的一份。平时, 他家改善早点什么的, 都由孩子们敲门送来, 奶声奶气地亲热呼唤: “奶奶! 奶奶!” 这甜美的童声让我沉醉。他们何止省去我的做饭时间? 可我并未给他们任何贡献, 长期受之, 实在愧不敢当。一次我对他家保姆说: “如何是好?” 保姆说: “不要紧, 她父母很大气。你有一份, 我也有一份。她妈妈人好, 特地关照: 别忘了给隔壁奶奶一份。”难怪她会说: “这都是举手之劳, 你不要客气。家里弄的吃着放心, 做时给你带一份很方便。我妈说给老人吃, 会有福的。你不要不好意思, 远亲不如近邻, 就该这样!” 他家有善良仁爱的医家慈母, 三代传承着友好爱邻的家风! 最近, 楼里搬来一家四口, 有时陪着孩子在走廊跳绳, 恰逢我电脑卡住, 孩子的妈也会热情地助我。我庆幸与这些年轻人做邻。

我是个翻译匠, 要搞翻译, 又是个教书匠, 要教翻译。所以免不了看关于翻译的书。但看这种书居然笑得肚子疼, 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准确说来, 是头两次。

一次是看余光中的《翻译乃大道》, 有一篇谈他当年在加州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时用的课本《中国文学选集》, 谈及《前赤壁赋》英译的“大错”: “余音袅袅, 不绝如缕, 舞幽壑之潜蛟, 泣孤舟之嫠妇”, 最后一句被译为“一位寡妇在我们的孤舟上哭了起来”(a widow wept in our lonely boat), 哭得我大笑起来。余氏评曰: “试想苏子与客泛舟, 带一位寡妇干什么? 几个男人和一位寡妇‘相与枕藉乎舟中’, 在北宋时代可能吗?”

另一次也是看余光中。在《听听那冷雨》这本书中, 余氏认为“精确”固然是翻译的一大美德, 不过若以牺牲“通顺”为代价, 代价就太大了。如下面这句英文: Don't cough more than you can help. 要保持“精确”, 势必译成“不要比你不能咳的咳得更多”, 甚至“不要咳得多于你不能咳的”。可是这像话吗? 其实, “不能咳, 就不咳”, 足矣足矣。

无需说, 前者是中文理解上的错误, 英文本身没问题; 后者则相反, 理解没问题, 问题出在表达——不像话, 不像中文了。貌似“精确”, 实则不伦不类, 有话不好好说。余氏为之忧扰的, 更是后者。

单从藏书的数量和品质来讲, 我没有被称作“藏书家”的资格。就藏书的学问来讲, 我更是脑袋中一片空白。当身边有人问起我藏书多少的时候, 我总是不敢回话。我会在心里纠正对方的提问。因为我的书不是用来藏而是用来翻翻看看的。只是翻得多了, 好像有了一种藏的架势。



确, 理解错了, 改过来就是。而若通篇有话不好好说, 就成了语体、文体上的毛病, 改起来活活要命。这玩意儿我也改过, 自然深有同感。

更让我有同感的是, 余氏作为外文出身且身为外文教授, 却很少谈论外文多么重要, 而是胳膊肘向外扭, 总是强调中文何其了得。《听听那冷雨》有一篇题为《外文系这一行》, 其中写道: “文学批评如果是写给本国人看的, 评者的中文, 不能文采斐然, 至少也应该条理清晰。至于翻译, 那就更需要高水平的中文程度了。不幸中文和中国文学的修养, 正是外文系普遍的弱点。我国批评文体的生硬, 和翻译文体的别扭, 可以说大半起因于外文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济。”

余氏还为翻译和创作在外文系、中文系不算成果而鸣不平: “中文系如果拥有一位李白或曹雪, 岂不比拥有一位许慎或钟嵘更能激发学生的热情?” 关于外文系, 余氏表示: 如果玄奘、鸠摩罗什、圣吉洛姆、马丁·路德等译家来求教授之路, 我会毫不犹豫地优先录用, 而把可疑的二流学者压在后面。

余光中这话是二十多年前他当台大外文系主任时说的。今天呢? 怕也依然如故。在绝大多数系主任以至校长眼中, 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能比得上许慎的《说文解字》吗? 那可是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啊! 曹雪芹(曹雪)的《红楼梦》能

先说香港有钱的作家吧! 第一, 必然是武侠小说大家金庸, 浙江海宁查家系名门, 金庸承其后, 在香港办报、写小说, 身家估计二十亿港币。有人持异议: “金庸办报赚铜钿, 讲到小说收入, 不如倪匡!” 此言差矣, 金庸十多部小说不比倪匡百多部卫斯理多, 可要知道, 金书厚, 定价高, 不独风行香港、台湾、东南亚和外国华人圈子, 还风靡中国大陆, 这还了得? 天文数字! 有了钱, 小屋搬大屋, 先是渣甸山, 后更上一层楼, 移居山顶道一号巨宅, 那是香港房价最高的地区, 一个平方英尺, 好几万。查大侠索性重居不重穿, 初识君, 衣着简朴, 不修边幅。后经贤妻督促, 方始变身。其次者自是倪匡, 老顽童乃传奇人物, 别的作家闯文坛, 或多或少遇投篮之苦, 好一个倪匡, 风调雨顺, 从未遇过。一投中铜, 之后百发百中, 从投《工商日报》始, 到《明报》止, 写字数千万, 因而自称世界写字最多的人。他写小说, 范围广衍, 科幻、武侠、奇情、情色、推理, 无一不包; 后更兼写剧本。七八十年代, 稿费收入, 每月已近二十万, 后改写剧本, 先是两万一个, 因电影大卖, 水涨船高, 升至五万、八万甚至十万。倪老爷写剧本, 有两个原则, 第一, 出门不认货, 例不修改; 第二,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银货两讫。曾对我说: “有人找我写剧本, 我一律勿推, 花花钞票人爱, 没人嫌多, 对勿? 人家声明要快, 赶戏。All Right, 没问题, 一个礼拜你来取。来人听了, 两眼翻白, 以为我吹牛皮。不怪他, 别的编剧嘛, 至少一个多月, 嘻嘻!” 一个星期? 有没有骗我? 半信半疑而离。一星期后登倪府, 果然交货。我跷起大拇指, 赞不绝口。倪匡笑眯咪: “老实说, 我四天已写好, 怕人说我拆烂污, 且把它收诸抽屉多三日, 哈哈



闲登小阁看新晴 (中国画) 李知弥

比得上钟嵘的《诗品》吗? 那可是填补学术空白的诗论专著! 至于躲进大雁塔闷头搞佛经翻译的玄奘, 当教授更是比西天取经还难。即使同搞翻译, “不要比你不能咳的咳得更多”这种所谓学者型翻译, 也肯定比土里土气的“能不咳, 就不咳”更入校方法眼。

影响所及, 堂堂高等学府, 不仅没了李太白的斗酒诗百篇, 甚至刘姥姥自然而然的幽默感也没了, 以致十个教授有八个不会写文章: “中文不济”。而“中文不济”造成译文“不济”, “不济”的译文又反过来导致原创中文“畸形欧化”。“畸形欧化”的文体对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影响尤其显著而易见。余光中举例说“进行”几乎成了万能动词: “我们对国际贸易问题已经进行了研究/ 心理学家在老鼠的身上进行试验”。余氏质问, 为什

么就不能说“详加研究”和“用老鼠来做试验”?

无独有偶, 日前用智能手机看某官方公号上面的一则报道, 谓“近日中国C9高校校长专程到华为进行了参观拜访, 任正非进行了热情接待”。同样, 为什么就不能说“到华为参观访问(拜访亦欠妥)/ 任正非热情接待”? 余氏当年感叹: “这种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的译文体, 如果不能及时遏止, 总有一天会喧宾夺主, 到那时, 中国的文坛恐怕就没有一寸净土了。”

危言耸听? 不! 余氏如此感叹的当年还没有网络没有手机。而现在, 网络文体、手机文体正在大行其道, 大举进攻。说痛快些, 中国人好像越来越不会说中国话了。谢天谢地, 眼下还没听到有人说“不要比你不能咳的咳得更多”……

再数下来, 必然挨到怪论名家三苏, 原名高雄, 作家柯灵之侄, 浙江绍兴人, 鲁迅同乡, 同乡三分亲, 笔触最相近, 尖酸刻薄, 嬉笑怒骂, 仇者痛, 亲者快。文笔不依常规, 教人意想不到, 写稿如车衣, 右手握管, 左手拖拉, 一个小时, 四千五百字, 等闲事儿, 可跟快笔倪匡比肩。稿费特高, 家在半山天后庙道华夏, 环境优美, 布置雅致。当然还少不了爱情大家依达, 原名叶敏尔, 上海人, 写的爱情小说如《梦妮坦日记》《垂死天鹅》等, 六七十年代风靡香港少男少女, 一字千金, 难怪买得起太古豪宅, 晚年隐居珠海, 不问世事。

穷作家嘛, 一大箩, 一百根指头都数不完。先说说我的老大哥萧铜, 北京通, 胡金銓筹拍《龙门客栈》, 京腔都要请教他。不说不知道, 萧铜乃京剧专家, 崇京派鄙海派, 自台归港, 诸事不顺, 家居凄隘, 只好把茶餐厅当办公室, 一瓶双蒸, 半包花生米, 边吃边写, 怡然自得, 却不知惹侍者厌。稿费低, 要多写方能糊口。1995年, 家中一场大火, 烧光书籍也夺了萧铜老哥宝贵性命。

可怜吧? 不, 比他更不堪的多的是, 诗人柳木下便为当中一人。柳木下学问好, 性格乖, 诗在香港本已不属主流, 何况柳木下写得苦涩深奥, 那就更卖不了钱, 只好背着载满旧书的布包, 找朋友帮衬: “老兄, 这是我花了不少心血才买得的, 如今有急用, 希望你能买下。”看他可怜, 朋友纷纷解囊, 一二十元, 小意思。隔了一段时间, 不见踪影, 朋友们念叨了: “阿柳去了哪里啊?” 总盼着他的来, 可阿柳没有来, 他像烟一样地消失了。

富作家与穷作家



沈西城